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三年之后（代跋）

三年多过去了。政权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到年轻民主派的脚前。而结果——自由胜利的三年的结果是狂暴的集会、示威游行、对俄罗斯人的枪击、轰炸、导弹打击。我们民主派的所有象征和论据都实现了。

看着当代领袖的面孔，我感到很惬意——年轻的、精心保养的面庞，明亮的、天真无邪的目光。不，这不是从前的自私自利者，而是全新的人物。不错，在他们之中也可看到一些老相识。但是这些老相识一点也不影响总的印象，他们紧随着整齐的政权队伍，满怀信心地同年轻一代步调一致地前进。这种精神、利益、观点的统一终究令人十分感动。

我漫步城市，都不认识莫斯科了。一个个新名称的街道、地铁站，各种文字的和色彩斑斓的招牌，霓虹灯广告，一排排望不到头的商店、货币兑换处、银行、报亭、“奔驰”汽车、吉普车，到处是商人，好像全莫斯科人都出来经商了。什么东西都出售——牛仔裤和皮鞋、电视机和房子，连同工程的企业和双人浴缸。穿皮夹克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分称进口的棉纱，拖着装满啤酒、伏特加、糖果的箱子，或批发或零售。一个穿着长长的女针织衫的老太太在出售电灯泡、门门鼻和一瓶某种颜色的液体。一位老兵用颤抖的双手托着一个皮带扣环、一枚红星勋章和其它一些什么奖章。为什么要使他受到侮辱？这位老兵一生中不仅经历了大血战，而且经历了重建家园的艰苦时期。我们对他和像他一样的人所欠的，是无法偿清的。他们捍卫国家，重建国家，使人们得到面包、受到教育，而这些人现在却使他们一贫如洗。

身旁是食品商店的新奇的橱窗和外汇超级市场的挂着帘子的窗户。人们的目光掠过橱窗，丰富的食品和鲜艳的包装令他们惊叹不已，说不出话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粮食计划之父，您在哪里？原来，用不着增加田地和农场的产量，而完全相反。现在农业生产下降，可是您看柜台多丰富。正像一位民主派信徒说的，甚至连棘维果都有，看来真是商品丰富到了极点。现在有一句俏皮话：资本主义就是民主派政权加全国棘维果和香蕉化。诚然，棘维果不是畅销商品，比鸡蛋稍大一点那么一块，价格就等于一个长面包的价钱。人们不知为什么更喜欢面包，而购买其它的“漂亮货”也没有太拥挤的排队现象，大多都是看看。

但是也有人连看都不敢看，这些人像影子一样走在脏乱阴暗的街道上。这群愁眉苦脸的人流露出某种失落的和绝望的感觉。在肮脏昏暗的地下通道里是一幅令人心酸的景象，一个上年纪的男人在拉手风琴，演奏战争时期的一支曲子。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面前放着一个装有几张小面值卢布的小铁筒，用眼光乞求着帮助。妇女不时地用自己的薄大衣的下摆盖住冻得发抖的孩子，大一点的男孩用一双冷冰冰的深邃的眼睛漠然地看着匆匆闪过的行人的脚，每当有人往铁筒中扔下一张皱巴巴的卢布时，他就兴奋地抬头望一眼母亲。难民。仇恨的风把他们从哪里刮来，这些谁都不需要的人能被安顿到什么地方？

城郊电气火车挤得满满当当。穿着同样的夹克和戴针织帽的男男女女脸颊冻得通红，他们坐在长椅上及巨大的包裹上和旅行箱上，这些东西塞满了车厢过道。他们喝着水和啤酒，嘴里嚼着什么，骂着，笑着，清点着钞票。

这些商贩是现代的货郎，是贸易的动力和国货市场崩溃的见证。靠窗有几个年龄很难确定的醉汉正在玩牌，嘴里不断骂着脏话。边上是一个穿老式大衣的妇女，几个面庞白净、认真听商贩谈话的女中学生，一个脚蹬雨靴、头戴大沿帽的老农和他的戴着护耳帽的孙子，孙子背着一口袋在市场上没有卖掉的既不像是苹果也不像是土豆的东西，口袋里插着一杆弹簧秤。

俄罗斯动起来了。看着车站和车厢里拥挤忙乱景象，我不禁想起战后那几年。那时满目疮痍、疲惫不堪的国家也动起来了。人们从疏散地返回，前线战士各自返回故乡，城里人到农村换东西，用旧衣物、家具换面包、土豆。现在经济破坏又使国家动了起来，又使人民踏上征程。这是为什么呢？好像到处都是所有者，每个人都得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国民财富被分配得如此巧妙，以致它不能保护免受贫困。机会相等和普遍幸福的社会没能实现，民主化以它应有的方式结束了：对财产实行有利于强者的再分配。去他的所有权吧，过去没有它的时候我们虽说生活得不富裕，但也不受穷，有自己的尊严。我们建造了许多住宅、医院、学校、幼儿园。

过去那种生活结束了。现在在俄罗斯国土上成立的是什么国家——让人弄不明白。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得以匆匆实行的那种半封建半国家资本主义的大杂烩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它带有深刻的危机，完全没有能力自我发展。改革的能量、进攻的能量还没有产生积极结果就消耗殆尽了，同人民的阵地战已经开始：全断面掩体已经挖好，民主派已在按照全部兵法规则准备防御。组建了新的特种部队，加紧特警的操练，展示力量。但是愈是使用武力，政府就愈软弱。我有时总想，政府大概都愿意回到1991年，以便许多事情从头开始。但是已经晚了。火车开走了。现在不仅扩大再生产没有可能，而且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主要经济部门都越来越深地掉进深渊。

被称作苏联的伟大国家已不复存在，我担心俄罗斯也将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导弹和核武器还有，但是国家的实力已经看不到了。工业的擎天柱——许多大型工厂奄奄一息，农村在分化，牲畜被宰杀，播种面积减少。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成就——社会消费基金也没有了，该基金曾不仅受到我们的珍惜，而且受到从苏联的成就中学到许多东西的全世界的重视。

这一切遭到破坏并不是因为结构改革，而是由于管理体系和合作社联系瓦解，由于领导人和工人崇尚经商、职业水平下降所致。不能把国家统一的经济综合体一下子化整为零并以为这会使大家生活变好、被破坏的东西是很难再恢复的。

民主派瓦解了国民经济、使我们的许多幻想破灭了。但是我们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而且失去了自我。矿井、轧钢机、高炉停产，人民的精神力量糜烂崩溃。人民的各种理想均被贬值，支撑人和社会的核心被破坏，而正是这个核心在各个时期使社会变得强大有力。在俄罗斯人的心中祖国、爱国主义的概念已经不存在，正直坦诚、宽宏大量、虚怀若谷这种最伟大的民族财富也被丢掉了。国家在5~7年前开始丧失的东西导致现在的文化衰落、轻视科学、社会道德败坏、社会分化等结果。这一政策的果实正在人的最卑鄙最阴暗的灵魂深处成熟，这就是冷酷无情、贪得无厌、野蛮残暴。人的生命一钱不值，肉体上被消灭，精神上受摧残，忍饥挨饿，被病魔折磨而死。俄罗斯正在消失，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这个伟大民族的人才资源正在枯竭。我国同胞的最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可怕的沉默和积聚仇恨，这种仇恨可能顷刻喷发出来，成为巨大的失去理智的和消灭一切的暴动。

三年过去了，新的事实对戈尔巴乔夫背叛祖国利益的情况又作了补充。

是什么原因使他自 1989 年起十分起劲地（虽然不总是彻底地）使党、管理机器、整个国家与其说是转向社会改革，不如说是转向苏联国家的经济崩溃，转向党的瓦解！

时间一长面纱就会撩开，秘密就会暴露。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谈这场悲剧的原因和条件了。这些原因和条件是什么？首先是对改革的支持，这种支持使领袖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早在 1986 年总书记就相当牢固地掌握了社会舆论，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对实行改革的广泛支持。他赢得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起了不小的、看来是很大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同里根和布什在雷克雅未克、华盛顿、马耳他、莫斯科的会晤，两位领袖宣布的目的和意图导致西方把赌注押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并对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实行的改革进行史无前例的有利宣传。戈尔巴乔夫对这些赞美之词没有警惕，而是很受鼓舞。那些对自己的状况不满、特别敏锐地感觉到西方气息的祖国精英也支持他。

所有这一切为戈尔巴乔夫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转变？我想是意识到了。至少许多人是意识到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从原则上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问题。也许这是因为这些机关工作中的集体领导体制和共同协商原则遭到了破坏。戈尔巴乔夫固执己见，甚至在没有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通过决定。总之，通过决议的程序和会议上的局面本身都需要改善。近几年讨论问题时缺乏创造性的、同志式的态度，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之间、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雷日科夫和梅德维杰夫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局面显然对事业有害，可是没有一位领导人想要改善这种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说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方针吗？政治局委员在不同意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最多就是沉默。例如，雷日科夫只要试图反对某些不成熟的决定，梅德维杰夫马上就会作针锋相对的发言，他随时准备捍卫戈尔巴乔夫的路线，不管这路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至少在我参加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期间我没有听到有谁想弄清总书记要把党和国家带往何处，尽管他们之间私下经常谈论这个话题。

现在才清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早就在考虑分裂党、把社会民主派从党内分离出来。社会和党对许多改革思想越来越抵触，对总书记越来越反感，这种情况迫使他加紧行动。总书记的许多行动说明了他分裂苏共的意图，他客观上需要肢解国家，因而需要在各共和国建立不大的或被削弱的党。这也同共产党人的威信遭破坏有关，当时报界把过去所有实际的和臆造的错误都归罪于他们。

戈尔巴乔夫会认为苏共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吗？大概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自诩为正派的人，他应该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论证自己的立场，或者让共产党员确信必须进行变革，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辞去总书记职务。但是总书记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秘密手段破坏苏共和苏联。不仅如此，大概除了雅科夫列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三人，谁也不知道他的意图，包括总书记说的他最信任的安全会议的战友。用不想伤害党员为这种两面派行为和谎言辩护的做法今天看来不是简单的伪善行为，这是旧病复发和旧思维的残余。这不是为解脱而撒谎，这是公开的背叛，如果谈到某种解脱，那也只是解脱自己。遗憾的是，这些事实要过几年后才会清楚。

四年前有几个安全会议成员曾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说如果继续奉行他选

择的破坏国家的方针，国家就会发生变故。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分析——从经济到军队的状况，从党和人民的情绪到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分立主义行动，结论只有一个：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制止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瓦解，保证苏联各地区利益的统一。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发生灾难，于是他们作了防止发生灾难的尝试。

现在许多人都去回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人民书及其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而把上述国家领导人在 1991 年 8 月的行动看作是想使国家恢复老样子。也许那些想要攫取和巩固政权的人需要这种显而易见的谎言，但是今天还有许多人抱住这种谎言不放，至少下面这一点说明这些断言是毫无根据的。那些被指责想恢复斯大林主义的人不仅首先提出社会改革的问题，而且首先开始采取措施改善国内状况、坚持公开性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原则、利用有效的方法调节经济。而在这些领导人做这一切的时候，那些当今的民主派不仅不理解，而且从他们当时的公开演讲来看，他们连这些新词都还说不好。

符合宪法规定的机构——安全会议的成员即后来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和某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自己国家图谋不轨，因此在自己的告人民书中反对瓦解苏联和践踏人们在全民公决中表达出来的拥护国家统一的意志。他们声明支持改革方针，包括利用市场机制，支持社会进一步民主化，但是反对取消被证明有效的经营原则和劳动者在社会领域取得的成果。他们赞成继续进行国家管理体制、精减军队和武器，但是认为这一切不能仓促进行，不能作无谓的让步。他们赞成从前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撤军，但不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迫使我国接受的那种溃退的条件下。

告人民书还谈到在国内进行其他的渐进改造，也许为制止国家解体需要更有分量的论据。纵使怀疑所采取的决定正确性，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据我所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人主张用坦克直接瞄准并射击自己的同胞。但是在 1993 年 10 月却有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如何为自己在那个不幸的秋天采取的这一可怕步骤辩护，它都将永远成为我国历史上血腥的一页，而且看来不是唯一的一页。

前言

当本书即将完稿时，不仅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而且国家也解体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支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他们最初提出振兴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崇高目标和口号，但是由于争权夺利和个人野心，结果使生产下降；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使社会很多阶层贫困和破产；使俄罗斯人离开他们祖辈世代生活的土地——那里建有祖先的墓地、神圣的教堂、先辈的房产；使科学，首先是基础科学衰退；使国家的知识潜力和文化贬值；使许多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遭到破坏。我认为，我从道义上有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他如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无所作为。书中讲述了作为政治领袖的戈尔巴乔夫的发迹史，讲述了总书记在权力阶梯上的升迁和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立法机关中的争权夺利。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时他就有了改革社会生活的想法。当然，他那时尚没有系统的改革理论。这些想法多半是修修补补性质的，还不是对国家各方面生活进行改革，即后来向世界表明的那样。但后来全世界看到的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事实上的软弱无力。本书要向读者介绍改革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谁是改革的先驱，是谁提出的改革社会和实现民主化、公开性思想的。

首先，我打算谈谈作为普通人的戈尔巴乔夫，他的性格、习惯、兴趣、爱好、品质、工作方法，他为社会改革所作的努力。但是，本书并不止谈他一个人。本书要向读者介绍党的活动、党的状况、苏共最高机关的工作、政治局的力量分布、党的领袖们为夺权和提高自己的在社会中的影响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如果党没有在这场改革中被削弱，党的领袖不那么腐败，国家经济部门的科学技术改造速度不那么缓慢，那么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任何什么人，都不可能搞垮这个国家。当然，这种情况有利于国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巩固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不应忽视西方特工机关破坏性很强的宣传所造成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纵虎归山的错误做法，导致自己无法控制党内和国内的局势。他被迫放弃一个又一个阵地，却又不肯承认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这个时期的情况是苏联解体这幅画面上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奥加廖沃进程、加剧国家解体的新联盟条约的制定激怒了反对这一进程的势力。人们开始公开批评苏联总统的行为，说他不能或不敢捍卫自己的立场。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陷入进退维谷和孤立的境地。有时他也反省过自己的行为，但还是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尽管他知道，新联盟条约将使他丧失至关重要的权力，而俄罗斯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也使他的总统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他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促使强力部门的领导人采取了非常措施——在国内一

些主要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当他身边的人向他通报安全会议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必须承担起防止国家、经济、军队解体的责任时，他并没有感到惊奇。于是便发生了 1991 年的八月事件。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当时的详细情况。

书中主要内容包括：笔者在同戈尔巴乔夫及党和国家其他很多领导人交往中获得的个人体会、很多文献、我的日记以及我国那些熟悉总书记和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共过事的人的谈话。

如果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对过去的事件、对过去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战友不散布那么多谣言，那么这本书或许就不写了。一定要恢复历史真相，尽管这本书不可能把所有同总书记—总统有关的事件和事实都一一谈到。有些事件现在还不到谈的时候，换句话说，尚属国家机密的事不能谈，而有些事件涉及到我十分崇敬的人，我也不想把他们牵涉进来，还有一些事情很无聊，不值得一谈。

同所有这类体裁的作品一样，本书并不企望把所有人物和力量都谈得很全面。我在书中也没有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写，因此，书中难免会有不少违背历史顺序的现象。不应忘记，本书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事件对许多人来说都记忆犹新，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看法。

苏联社会主义崩溃四年了。对那些策划这场政变、挖国家墙脚、助长道德价值观变化的人干的勾当，现在人们已知之甚多。但我并不想改写 1991 年秋天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写成的东西。我尽量反映出国家剧变时我的精神状态和思路。或许，今后对有些细节和段落我还要再详细地谈，对占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这片国土上的悲剧的原因我还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书中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我事先并没有征得本人同意，如果对他们改革历史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话，那我先在此表示歉意。书中提到的人无论是被贬低或抬高，我都不是出于私心和恶意。

最后，我向所有帮助本书出版的人表示感谢。

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克里米亚专机

铁门发出了一阵吱吱的响声，我被带进牢房，随后听到关门和上锁的声音。周围一片昏暗，刹那间，我竟分辨不出这是在哪儿。我碰到一张铁床。离我半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洗手池子和抽水马桶。没有窗户，只有铁板上几个小孔透进几缕微弱的光。我仔细看了看，这原来是一个六平方米的单人牢房。我坐到床上，再次环顾这个新处所。没错，是单人牢房。这倒也好，现在我谁也不想见。腋下还夹着一些给我剩下的东西，但是皮带、领带、绳子都被拿走了，文件和钱也被收去了。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没办法，他们比我清楚。我躺在用铁条编织的床上，感到一阵金属的冰凉。大约过了五个小时，牢门打开了，来人把他们叫做午饭的东西放在洗手池子上。我没有动这东西。一小时后，我又被带到上面的另一间牢房里，我看见两双眼睛在好奇地盯着我。他们看出了我的身份，把下铺让给我，帮我铺好用破棉絮做的床垫。我收拾收拾就躺下了，想暖和暖和身子，但翻来覆去就是不舒服，身上感到一阵阵的酸痛。没法子，必须经受住这一切——往后的日子只会更糟。

今天我还曾躺在医院里。早上醒来时，听到走廊里一阵窃窃私语。随后病房的门打开了，护士探头看了一眼说：“大夫看你来了。”这女人脸上——副惊恐的神态，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来抓我了。来人把病号服扔到一边，向我出示逮捕证，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签发的。向我出示这份文件的人很像电视连续剧《行家侦探》中的托明少校。这位“行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很有风度。我穿上衣服，很快就坐进一辆“日古力”汽车。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胡同行驶着。据说，这些司机素质很差，又不熟悉莫斯科，汽车经常开进死胡同，所以要找一栋房子需要好长时间。莫斯科地区的街道挖得乱七八糟，这里正在进行房屋和公用设施的修建。终于，我们到达“水兵寂静”监狱。

我一来到这儿就被搜八了一番，很多东西被没收了。我脑海里开始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事，回想把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引到这个“可爱地方”的那段路。

……“明天 14 点整，国防部一架飞机从契卡洛夫斯卡娅起飞，不要迟到。”8月17日在克格勃接待大楼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你能走一趟吗？应该向总统讲明国内局势的全部真相。签订新联盟条约势必会加剧紧张局势，引发冲突和内战。他相信你。”

最近一周我住在医院里，每天打点滴，自我感觉很糟。但是，对濒于崩溃的国家局势的担忧使我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是契卡洛夫斯卡娅。今天是8月18日，航空节。跑道上不仅有军人，还有普通群众。看得出来，飞行员们是在搞节日庆祝活动。几辆黑色“伏尔加”驶到一架飞机旁。我们同飞行员互相问候一句，然后就顺着又窄又陡的舷梯登上“图-154”飞机。这里没有通常那样的宽敞舷梯，是飞行员帮我们进入机舱的。巴克拉诺夫、舍宁、瓦连尼科夫和我坐进了这架苏联国防部的飞机。机舱中间摆着一个大桌子，旁边是两扇开拉式门，一侧放着一个大沙发，另一侧是舒适的单人沙发，边上还有软椅。我们脱去了外衣。有几个军人和普通工作人员从门边走过，进入其他机舱。瓦连尼科夫下达起飞的命令。

发动机响起来了，飞机开始滑动，驶向跑道。飞机笔直轻松地离开地面冲向蓝天。我看到熟悉的莫斯科郊外，丛林、湖泊、蜿蜒的河流和别墅村。经过一阵急速的升高后，飞机开始较缓慢地增加高度。一片片白云遮住了大地，渐渐地只能从高空欣赏大地了：黄绿相间的田野、村庄，莫斯科郊外的花园和菜园。我们要飞行两个多小时。我开始思考我们这次举动。我们干嘛要到这儿来？干嘛非要介绍国内的严峻局势？

从 1991 年 1 月起，与日俱增的困难是戈尔巴乔夫圈子里经常谈论的话题。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总统对局势很担心，曾委托安全会议一些成员制定实施紧急状态的方案。他听过汇报，但至今尚未下决心。他数次会见中央书记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他们都向总统介绍了经济崩溃、国家有可能解体的情况。新联盟条约草案忽视了人民在全民公决中要求保持统一联盟的意见。

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内部的离心倾向在不可遏制地增长，正走向相互隔绝。当时出现一场法律大战，各共和国纷纷通过决定，声明本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法律混乱的局面在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清楚，中央没有能力控制权力和领导国家。

军队和国防综合体的形势也在恶化。需要对核武器进行监督、经常检查和及时更换弹药，否则将会发生无法控制的事件。由于对生产核燃料、制造和更换弹药的工厂不够重视，致使这些企业出现停工、科技人员外流的现象。

一些著名的核科学院士向总统报告，核工业的未来没有安全保障。军队的情况则更糟。由于裁减军队，一大批军官无社会保障，无住房。经济继续下滑。同原料、配套产品供应商的联系中断。开始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煤炭、石油、矿产和其它原料、燃料的开采和供应量在减少。

与此同时，总统考虑的则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他担心自己威信扫地，所以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威信，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且帮助夫人出版回忆录，根据合同她将靠这本书获得大量外汇，还要再版……这本回忆录还计划在国内出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经常打电话，四处询问她的“处女作”在哪家出版社出版更好。

总统一家人也在准备过困难日子，他们储备了不少外汇。戈尔巴乔夫个人帐户上已经有 100 多万美元，是全苏著作权代理公司帮他搞到的稿酬。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贵重礼品、各种用外汇支付的奖金和其它珍品。所有这些现象不能不让人担心：总统会关心祖国的命运吗？他还有时间处理国家大事、关心经济形势和人民的社会状况吗？

最近一个时期，各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各级代表经常来信谈面临的困难，认为必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敲开总统的门，求见总统。但是会见常常毫无结果，他通常说：

“同志们，你们想办法吧，一切合理的东西我们都会采纳的。没有人影响你们工作，干吧！”

但是，他的话常使人感到他缺乏信心和害怕采取某种重要措施。戈尔巴乔夫渐渐地只会见外国人了。他们赞扬他，同他合影，仅此而已。既没有贷款，也不提供援助。甚至连在伦敦同七国首脑的会晤，除了西方首脑表示的良好愿望外，也是一无所获。

从 1991 年初开始，总统经常感到头疼的问题是自己在居民中不受欢迎了；而叶利钦的威信却在不可遏制地上升。为此、戈尔巴乔夫多次召集少数

亲信，讨论自己的前途：以后很可能实行全民选举苏联总统，用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威信？能否赢得选举的胜利？对能否在选举中获胜的问题，很多人谈起来都吞吞吐吐，但一谈到办法时，则说得十分明确：整顿国内秩序、同犯罪现象作斗争、遏制民族主义、阻止民族骚乱和流血冲突、改善工农业状况。而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方针，要搞市场，那就赶快行动，若用老办法，那就应坚持。通过这些会见、戈尔巴乔夫似乎又活跃起来，他开始不断地下达一些任务。

这里说的都是些具体问题。总统曾委托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和政府中其他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及经济学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帕夫洛夫负责制定反危机纲领，召开过多次会议，讨论过各种方案。但形势依然如故。总统始终没能果断地采纳改善经济状况、向市场过渡的纲领，不论是三百天计划，还是五百天计划。他的意志已经垮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重大决策了，他的精力只够应付同西方政治活动家频繁会见、写文章、准备答记者问。

有一次，在小范围讨论苏联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时，甚至出现过用“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办法来提高他的威信的想法。

“我们这儿受委屈的人、弱者和被孤立的人总是受到爱戴的。”当时有人这样说。但是这个想法似乎一闪即逝。

形势越来越清楚了，拯救国家的斗争早已变成维护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威信的斗争。但由于他没有能力进行大的变革，所以当时不可能出现积极的结果。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了。其实当时还没有实行向市场过渡的方针，也没有勇气和毅力实行向市场过渡的方针。当时搞的不过是一场复杂的游戏。

戈尔巴乔夫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1985年，他根本不接受这些词，害怕这些词，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词。

当时进行了多次争论，证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当然市场是受行政命令体制限制的。旷日持久的、反反复复的争论使他逐渐明白了许多经济学知识，不过他大多是在报刊发表了相应的文章后才接受某一观点的。

总的说来，刚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是很吃力的。不过应当承认，他接受思想很快，而且马上就能灵活运用，只是从他的个别用词上才能够发现他缺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

他学的是法律，但从未干过专业工作，始终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农业工作。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看来对农业还是很了解的，曾毕业于农学院的函授班。到中央工作后，一开始他相当自如地运用了在边疆区积累的知识，后来又相当快地适应了、全国性事务，尽管这种越级晋升使他在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方面出现很多欠缺。1982年，安德罗波夫调到中央后，开始让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政治局的工作，于是戈尔巴乔夫接触到更广泛的问题。但我发现，戈尔巴乔夫特别爱写文章，他认为“说”是自己最主要的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

一般情况下，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一些复杂的问题，他总是说：

“应该写篇文章或写本书。来起草个大纲吧。”

甚至在从福罗斯回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在说自己在休假期间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有人想搞政变的问题。其实，休假前要写篇文章也并不

不是件难事。

凡是和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摇摆，都知道形势的严峻。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内战和破产的边缘，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整顿。苏联总统被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逼进死胡同，被迫接受各种条件，甚至在人事安排上也要受他们的影响。在休假前不久，戈尔巴乔夫突然问我：

“你知道我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吗？他们要求解除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的职务，不让这些老头子乱插手。”

我对会见并不感到惊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会见，使我惊奇的是戈尔巴乔夫说的这番话。

“我听到的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说你们在讨论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的问题。”

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赶紧说：

“无论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我都不会出卖给这些领袖们的。我宁愿同他们一起下台……”

我明白了，戈尔巴乔夫最关心的是克留奇科夫是否知道他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如果克留奇科夫不知道，那么戈尔巴乔夫希望我能把他拒绝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要求的话转告克留奇科夫。但是由于我说了准备撤换克留奇科夫的事，戈尔巴乔夫便极力让我相信“瓦洛佳”同他的关系比朋友还深一层，有人散布这些谣言，是想挑拨他同战友之间的关系。他还说出了一些应该让克格勃主席憎恨的人的名字。

两三年后，我从克留奇科夫那儿了解到，他根本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谈话的内容，也不知道苏联总统背地里整他的事。

我刚一说到可能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取代克留奇科夫这件事，戈尔巴乔夫就忙不迭地解释，说这是谣传。他的主要论据是巴卡京在内务部没什么建树，许多有经验的干部都反对他，他在选民中也没有威信，选民知道这个人的价值。

“不，不会的，你千万别这么想。”戈尔巴乔夫劝我。

但是，他越花言巧语地辩解，我就越确信自己说到点子上了，无风不起浪。

8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通过一次电话，当时正在积极筹备签署新联盟条约。我虽然有病在身，但实际上每天都得去监督条约文本的准备情况，还要准备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纸、文件夹、各种盒子、笔、墨等文具和50多根旗杆。恰在这时，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他嗓门很高，怒气冲冲地询问各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开会的情况。我无法给他明确的答复。首先因为我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其次他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安全会议成员和助手。

“你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分立主义，这是不顾苏联总统的意见，地方官来决定国家大事。这是阴谋！我绝不会放过这件事，我要立刻采取措施……”

飞机开始下降。下面是一片片收割过的灰黄色的田野，零零星星的村庄，烟尘笼罩的厂房，公路上往来穿梭的汽车。后来，眼前出现大海。12年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海。飞机在降落，起落架放下时飞机抖动了一下。

前面就是飞机场，一排排重型军用飞机整齐地排列在那里。“图—154”

接触跑道后，发动机开始减速，飞机向机场大楼滑行。这是别尔别克军用机场，离塞瓦斯托波尔不远。舷梯准备好了，我们走下飞机。一队海军和空军军官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们向瓦连尼科夫作了汇报，同我们简短地、几乎不着对方一眼地互相问候一句。我们走进机场候机楼。这是一座新建筑，装潢考究，面积不大，两侧有很多房间，中间是一个大厅，这是专门用来迎接到这儿来度假的贵宾的。

陪同我们的军官说：“不久前，我们就在这儿迎接戈尔巴乔夫和共和国领导人。”

已经四点多钟了，必须抓紧时间。几辆黑色和亮灰色“伏尔加”开过来。我们坐进汽车，向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向福罗斯驶去。

我前一次到塞瓦斯托波尔和福罗斯是在1963~1964年，那以后就再也没来过。现在又看到了熟悉的街道。陡峭的山上有一个个凿出来的崖洞，大战时，这里是医院、仓库和指挥部。天气很暖和，但雾气腾腾看不到太阳。当大海出现在眼前时，我一时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海，海天连在一起。我们的车沿着海边又开了35分钟，眼前出现一幢红顶建筑。

这便是苏联总统的夏日官邸。我们离开大路向右拐，便驶进官邸区。大门口站着几位身材魁梧的士兵。

汽车驶向接待大楼。我们走进去。这是一座两层楼房，设计考究，建造坚固。宽敞的前厅，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克格勃九局局长尤·谢·普列汉诺夫上去通报我们的到来。但是，房间里没人，也许是不急于见我们。半小时后我们又来到别墅前厅等待。这座别墅很大，一层楼两侧都是房间。这儿有好几个宽敞的大厅，前面的一于大厅面朝大海，其余的是套房、餐厅和暖房。这儿的一切都非常豪华，完全是按照庄园的风格建造的，即使按那个时代的标准也够宏伟的了。用的全是我从未见过的进口材料，一句话，福罗斯城堡是一个“建筑精品”，其豪华程度、造价和建设速度都是创纪录的。

大约10~15分钟以后，戈尔巴乔夫来了。他一副病态，步履蹒跚，脸呈赤红色，这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是血压高的缘故，他给人一种痛苦和不满的感觉。他迅速同大家握手问候，不看任何人，怒气冲冲地问：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一下？电话怎么都不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什么问题？”

上面这番话是在往办公室去的路上说的。办公室不大，但很舒适。一张小桌子，座位背后是窗户，稍右一点还有一扇窗户，对面的墙边放着两把椅子。戈尔巴乔夫在桌后的软椅上坐下来，舍宁、瓦连尼科夫坐到墙边的椅子上，其他人就坐在窗台上，普列汉诺夫不在场，戈尔巴乔夫已不客气地把他请出去了。

“我们来的目的是讨论国内局势问题。”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话。

昨天大家在商量向总统报告的问题时，谁也没料到会得到这种反应。大家都以为彼此会饶有兴趣地讨论问题，同以往这类会见一样，能够得到戈尔巴乔夫准备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可现在谈话一开始就不顺利。我站在窗户旁边，望着总统。他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不知是神经炎，还是软骨病，或是全身不适使他这么难受。不管是因病还是其他原因，反正在休假这段时间里，他的举止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许是瓦连尼科夫的到来使他感到意

外，因为瓦连尼科夫以往从未参加过讨论实施紧急状态、稳定局势的问题，或许是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到他别墅来的缘故。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又问了一遍。

戈尔巴乔夫听到我们说来的人大都是他以前约请制定应付紧急情况措施的人后，情绪缓和了一些。

“就这些人吗？”他问。

“是的，就这些人。”

我觉得，他害怕听到来人是代表俄罗斯领导人的。他最担心的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谈，他认为这是某种阴谋。

“那么，你们想说什么呢？”他已经平静下来，问道。

“我想先从国内形势谈起。”巴克拉诺夫开始讲。“您知道，农业和工业的情况都很糟糕，可我们却在抓别的事情。”

“你说什么？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比你更清楚。”

他没让巴克拉诺夫说下去。这时瓦连尼科夫接着说，他以其特有的果断风格谈国内和军队内的局势。他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那么人民、军官、整个军队、军队的备战能力都将面临重大考验。但是他的谈话也被打断了……于是我又讲了一些大概戈尔巴乔夫还不知道的事：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反对他们没参加讨论的新条约。

“说得具体点。”

我们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几套方案，都是根据他的指示制定的应付紧急情况的内容。中心内容有秋收期间总统在一些地区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经济，确切些说，就是制止生产水平继续下降。这些措施由总统委托内阁或他信任的人去实施，但他对这些话没有反应。总统好像在想别的问题，他突然问道，紧急状态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到完全放心了。

“你们提出的这些方案最好能以充分民主的方式实施，因此，我建议先做那些迫在眉睫的事情。”

接下来便是心平气和的事务性谈话，而谈话基调变化的内涵我并未一下子捕捉到。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认真地谈了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和他为什么持这种态度。

“你们考虑考虑，向同志们转达一下我的意见。”他说。

握手告别时，他又补充说：

“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孩子、孙子们坐在前厅里。

“带来的是好消息吗？”她问巴克拉诺夫。

巴克拉诺夫走近她，对她说，带来的是美好的愿望，一切都会好的。我们只谈了些国内局势问题。作为您的朋友、我们祝愿你们家万事如意。

我们走出庄园，大家对这次谈话的过程感到惊奇。

“他不久前还认为实行紧急状态是唯一的出路，现在怎么变了？”巴克拉诺夫失望他说。

“那么你想让他这种大人物当众说‘行’吗？”

“即使对并非这样微妙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也从不说不说‘行’或‘不行’，他通常是用一些感叹词，用沉默或转移话题的办法来回避问题，以免打击积极性。”我们对刚才的会见互相交换着看法。车来了。只好打消想游泳的念

头。天开始黑下来。

汽车开上公路。回去的路好像短了很多。

在别尔别克，飞机已经做好起飞的准备。我在候机楼旁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我发现大家都已经上了飞机，几位送行的军人也道别后离去了。我这时才登上舷梯。飞机滑行了一阵，在起飞前稍停了一下，然后就在发动机的呼啸声中冲向跑道，接着是快速起飞和升高。天已经黑了，大地突然消失在暮霭中。不知是海上，还是陆地上仍闪烁着微弱的灯光。

再过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到莫斯科了，到时会有人给我们端茶和糖来，可我现在既不想吃，也不想喝。

飞机在莫斯科降落时，天已经全黑了，又冷又潮。等候在机场上的车一开过来，我们就赶快坐进车里。普列汉诺夫不时地催促司机：“开快点。”但是这些汽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在红村街附近有辆汽车的轮胎爆了，真是快到家了还出事。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去修理，很快又上来一辆空车把我们接走。10~15分钟后到了克里姆林宫，我们走进政府大楼，上到二层。走廊里有很多人，大多是卫兵。

我走进办公室。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中，我看到有几个人正坐在一张铺着绿毡子的长会议桌旁。我先看到亚纳耶夫，然后才看到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亚佐夫、普戈。我在桌角旁坐下来。舍宁在报告情况，他来得稍微早一点，已经加入到谈话的行列中。服务员送来茶和面包。我开始注意听。舍宁讲话既稳重又有说服力，他谈了见总统的事。亚纳耶夫请其他人补充。巴克拉诺夫补充了几句，但是没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意见。我没什么补充的。

在场的人激烈争论起来，焦点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突然拒绝实行紧急状态怎么办，大家意见不一致。有人说：

“既然总统下说‘行’，也不说‘不行’，干脆一切还照旧吧。”

“那么你是想让他向全世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吗？指望他这样做，那可太天真了。这种事情一般都不会这么处理的。”

“但是决不能让国家继续垮下去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或许，还是不让戈尔巴乔夫出面为好，免得损害他的国际威望。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来。”

不断地有人进出办公室，不断地响起电话铃声。大家都在等待着，不停地找人咨询和商议，不断地有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来。

时间已是午夜，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糟。我离开病房这么长时间，医院里恐怕也乱了营，我起身回医院去了。

8月18日，我所喜欢的航空节过去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究竟作出了什么决定。我一点都没料到，这会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相对平静的日子。我当时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一些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承担起那么大的责任，而另一些人则那么卑鄙地落井下石。

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一切，那你就永远也不要说已经了解了生活和人世。

我一向不能容忍那些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人。我认为，拍马屁的人或者能够拍马屁的人，往往就是落井下石的人。我是否可以不去福罗斯呢？当然可以，完全可以。我已经住院一周了，而且感觉很不好，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拒绝一切活动，但是我深知国内局势的严重性，联盟眼看就要解体了，我无权对这一切袖手旁观。我经常会见拥护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有些甚至是戈尔巴乔夫最信任的人。戈尔巴乔夫委托我同他们见面，帮助他们工作，

所以他们的意见我是了解的，况且这时国内局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我是充满信心去的，并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奇怪，况且他自己也经常说必须实行紧急状态。当他得知以叶利钦为首的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会见时，就称这次会见是阴谋活动，打算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至于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想不顾全民公决的结果搞垮苏联，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但是当时的确必须扭转局势，阻止联盟解体。

……我从惊慌中醒来，打开电视，一切全明白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告成立，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国家安全会议的其他成员接管国家政权。播音员缓慢地、以一种忧伤的语调宣读着这一文件。

我的第一个欲望是赶快去工作单位了解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医院里要进行例行的治疗检查。我到单位时已经很晚了，街上是摩托化部队和坦克。有人对我说，亚纳耶夫找过我。我拨通他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电话。当我来到苏联副总统接待室时，看到那里已聚集了很多人，不时有人被叫进去，有人从里面出来。我没有通报便走进去，在办公室墙边坐下来。没有人注意我，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在经济方面要采取的措施。不知为什么，帕夫洛夫不在场。

亚纳耶夫不时地走到另一间房子去，同一些人通电话，不时地接待一个又一个人。大家都在忙，这时你去询问自己该于什么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接待室也聚了不少人，我把各部门头头召集来，告诉他们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广播和电视中时不时播放着低沉的音乐。我开始整理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文章手稿、书信、戈尔巴乔夫的演讲稿，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时间处理，有的要销毁，有的要存档。看来，除了克留奇科夫以外，谁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同他又一时联系不上，我很快回到医院。

我们国家的生活发生了最富戏剧性的变化。电视播放的内容也开始出现变化。

我得知，戈尔巴乔夫中断休假，正在从福罗斯赶回来。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巴克拉诺夫、伊瓦什科，后来还有俄罗斯代表团飞去“解救”他，他们演出了一幕拯救总统的戏。总统扮演的是一个可怜的受迫害的角色。他看上去邋邋遢遢，穿了一件粗布上衣，可能是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谁也没把他关在福罗斯别墅的地下室里呀？他扮演可怜角色倒是很成功。但是正如后来事实表明的那样，他已经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威信了。看来，总书记及其家人把角色扮演得过头了。在他的讲话中，在戈尔巴乔夫家人及随戈尔巴乔夫一起去休假的作家杜撰的那些离奇故事里，不自然的、牵强附会的东西未免太多了些。

有人在夜以继日地突击起草所谓的戈尔巴乔夫被囚时写给国际社会的呼吁书，据说，曾物色了一位年轻的女信使，为保险起见，她按照足智多谋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建议，将写好的文件从一个秘密地点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地点，以迷惑那些可能知道隐藏呼吁书秘密的契卡人员。还有一个备用计划，打算让一个泅渡能手把呼吁书送到雅尔塔或敖德萨，然后交给可靠的人。

世界各国人民和美国总统都是通过秘密渠道才了解到戈尔巴乔夫没有参与策划这场“阴谋”，但是，正如后来很快就尽人皆知的那样，当时人们就不太相信这些故事。

早晨，仍旧是有限的几条电视新闻，电话仍然不通。我明白了：时候到了。我在“水兵寂静”监狱又呆了几天。一天过去之后，接着就是漫长的早秋之夜。